

BAIHUA
PROSE SERIES



主编 林 呐 徐柏容 郑法清

谢冰莹散文选集



百花散文书系

主 编 林 呐 徐柏容 郑法清

谢冰莹散文选集

傅德岷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02号

谢冰莹散文选集

傅德岷 刘享祿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092毫米 1/32 印张0 1/8 插页2 字数195000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06-0868-1/I·781

定价: 5.70元

编辑例言

一、本套《现代散文丛书》是《百花散文书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选收一九一七至一九四九年期间散文家的名篇佳作，按人专集分册。

二、入选的作者均是这一时期的散文名家，所选作品尽可能照顾到作者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

三、每集作品前均冠以万字以上的评论性序言，简单介绍作者生平，并结合本书所选散文，分析评介其艺术特色及创作发展的道路和影响。

四、所选作品，尽量注明原书发表的出处和时间；对于个别难理解的地方亦加以必要的注释。

目 录

序言	傅德岷 (1)
爱晚亭	(25)
当兵去	(28)
从军日记	(31)
寄自嘉鱼	(35)
被母亲关起来了	(40)
第四次逃奔	(58)
奇遇	(72)
穷与爱的悲剧	(83)
饥饿	(90)
望断天涯儿不归	(94)
海上孤鸿	(101)
秋天的落叶	(108)
秋之晨	(110)
黄昏	(113)
大榕桥的夏夜	(116)
海滨之夜	(119)

樱之家	(123)
雨	(126)
湖南的风	(131)
我认识的亚子先生	(138)
樱花开的时候	(143)
铁窗外的阳光	(152)
第二次审问	(157)
逃	(162)
重上征途	(171)
战地中秋	(175)
到上海去	(178)
大场之夜	(181)
酒与炸弹	(186)
战地情书	(188)
地狱中的天堂	(191)
战士的手	(199)
笔	(203)
雾里过花秋坪	(211)
再会吧，成都！	(217)
失望中的希望	(220)
旧地重游	(224)
生日	(227)
鸡蛋的故事	(232)
独秀峰	(237)
龙隐岩	(241)
华山游记	(252)

乳花洞	(268)
塔伽之游	(271)
济南散记	(275)
自清先生二三事	(279)
两块不平凡的刺绣	(282)

序 言

傅德岷

谢冰莹（1906—— ），名鸣冈，字凤宝，又名谢彬，湖南新化人，我国现代著名的“女兵”作家，以其丰硕的创作成果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1922年，她以“闲事”的笔名在长沙《大公报》发表处女作《刹那的印象》开始，到1948年去台湾师院任教，飘流海外为止，历尽艰辛与苦难，终于从一个个困境中挣扎出来，为国家、为民族、为真理，竭力呼喊，留下了满是血与火的散文篇章。重温这一页页的历史，我们深为谢冰莹那叛逆封建桎梏的精神，炽热的爱国情愫，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仇恨所感动；1937年，她重上征途，在戎装照片上题写的“不灭倭寇，誓不生还”的八个大字，至今仍动人心魄！可是四十多年来，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位蜚声中外的“女兵”作家几乎在大陆广大青少年读者中湮没。今天，是应该拂去历史的埃尘，认真地研究其作品的时候了！这本《谢冰莹散文选集》就是基于这样的动因而编选的。

艰难坎坷的生活道路

谢冰莹的一生是艰难坎坷的一生，她在大陆的岁月更是在同旧礼教、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反抗和拼搏中度过的。她在大陆反抗挣扎的四十二年，大约经历了五个时期：

（一）蒙童与求学

1906年农历9月5日，谢冰莹生于湖南省新化县大同镇谢铎山村。其父是前清举人，当地名流，曾连任新化县立中学校长三十年；其母曾读诗书，封建思想浓厚。她三岁时，便被许配给肖家的一位儿子。并要她少读书，裹脚穿耳，多学女红。

谢冰莹从小聪明，五岁时开始识字，八岁能背诵《随园女弟子诗》、《唐诗三百首》，并具有反抗精神。

1916年，她进谢铎山村私塾，在“近视眼先生”的教育下，读完《女子国文》八本，《四字女经》一本，偷学《论语》、《幼学》半册。

1918年，经过两天绝食斗争，其母才同意她进大同女校读小学。她大胆地解开裹脚布，放了天足。

1919年，转入新化县立高等女子小学校。她如饥似渴地阅读都德的《最后一课》和莫泊桑的《二渔夫》。

1920年春，改入益阳信义女校，这是挪威老处女爱娜（40多岁尚未出嫁）办的教会学校。她不愿读《新约》、《旧约》，不愿唱“上帝爱我无边，及到离世必保全”的赞美诗。并于“五·七”国耻纪念日组织同学校内游行，呼喊“打倒帝国主义”、“反对基督教”、“争取言

论自由”的口号，被“送”回家。

1921年暑假，投考长沙省立第一女师。在校长徐特立的教育下，思想自由，大量阅读小说，喜爱《水浒》，不喜欢《红楼梦》。“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品，喜看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的诗作和散文；外国作家中，爱读莫泊桑、左拉、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爱罗先珂等的作品，尤爱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

1922年，以“闲事”的笔名发表《刹那的印象》，写一位师长太太买了一个丫头，要人们品评好坏，她认为这是侮辱人格，把人当牲畜。以此文来表达她燃烧着的不平与愤怒。

1925年，长沙发生“六·一”惨案，学生们整队去省府请愿，要求缉拿“六·一”惨案的凶犯，取消二十一条，抚恤死者家属。她积极参加游行，外出讲演，揭露帝国主义的罪恶。

（二）从军与“飘泊”

1926年，北伐大革命爆发。她在二哥的支持下，决定去从军。冬，经过曲折到了武汉，在两湖书院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六期女生部当了“女兵”，受着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

1927年5月，随军北上，去河南，参加西征。她平均每天至少要走八九十里路，“晚上有时睡在一张门板上，有时睡在一堆稻草里”。她或牺牲睡眠，或于休息的几分钟里，在巨大的灯光下，用膝头当桌子，写《从军日记》，寄给武汉《中央日报》副刊主笔孙伏园先生。

孙先生认为这些日记和书信体的文章，表现了新时代

女性的觉醒，便陆续将这些文章刊登在1927年5月14日—6月22日的副刊上，立即轰动了文坛。

1927年夏，经过一个月零四天的战事，为保存革命实力，女生队解散。她拖着两条跑肿了的腿，回到了家。其母即逼她同肖家公子肖明结婚。她没有屈服，连逃三次，均被抓回。最后只得假意结婚，到了肖家，同肖明谈判，只作了名义上的“夫妻”。

1928年春，应大同女校之聘，终于挣脱了家庭监狱，奔到长沙。不料被当作××党而被捕，遭受毒打。后因法官曾是其父的学生，同意取保释放。出狱后，去衡阳湖南省立第五中学附小当国文教员。

1928年6月，因教书认真负责，引起教务主任的嫉妒和不满，毅然离开衡阳，回到长沙。不久，带爱珍（女孩）一起到汉口，后转上海，找到孙伏园先生。

1928年7月，经孙伏园、钱杏邨（阿英）的帮助，考入位于法租界内的上海艺大中国文学系二年级，同电影明星王莹同学。在这里，过着穷困的日子，每天以四个小烧饼来代替三餐饭食。后竟挨饿，四天没吃饭，只好去春潮书店预支《从军日记》的稿费。

1928年秋，因上海艺大的学生办了平民夜校，成立了摩洛文艺研究社，被法租界的巡捕诬为“反动分子”，抓捕学生，解散上海艺大。她又成了徘徊于马路上的一片孤叶。

（三）北上与南下

1929年，她应三哥之约，于“五一”劳动节登上去天津的海船。到北平后，住河北省妇女协会，后到《民国日

报》社，与陆晶清一起合编副刊。不到两月，报纸被查禁，又回妇女协会，准备考学校。

不久，考入女师大。考试中，她的地理只考了4分，并在试卷上写下责备出题教员的话，本来是不录取的。因她语、英、算三门考得不错，文学系主任黎锦熙又力争，她才得跨入“红楼”（女师大别称）之门。

这时期，她一面读书，一面教书，一面写作，努力挣钱养活自己和刚生下不久的女儿符冰。她在安徽中学和大中中学每周兼12小时的国文课，每次改作文95本。每晚12点前改卷子，12点后写文章。由于她的文章针砭时弊，大报副刊不敢登，劝她写“软性”文章，她拒绝了，只好更换笔名，不敢用谢冰莹三字。

后来，由于丈夫符浩（她北伐时的同学，年轻诗人。由于误会，他们感情产生很深的裂痕，致使她多次想自杀。）被捕，她从西单小口袋胡同搬到石驸马大街内浸水河22号。

这时期，她积极参加左翼文艺活动，是北方左联的发起人之一。她与潘漠华、杨刚等过从甚密。她参加过几次进步戏剧公演，主编过一个妇女月刊。这样，被国民党当局视为“罪犯”，上了黑名单。

1930年冬末的一天，她得知要逮捕她的消息后，当晚乘津浦车南下，不得不失掉即将到手的女师大的毕业文凭。

她从南京转武汉，把孩子交给符浩的母亲后，在武汉卖文为生。为了不出麻烦，只好回到湖南湘江对岸岳麓山的昆涛亭隐居起来。不久，她回家乡与母亲见了一面后，

又到上海寻找新的出路。

1931年仲夏，她在上海红湾的黑房子里，忘命地进行写作，以一天13000字的速度，不到三个星期就完成了《青年王国材》和《青年书信》两部书稿。两书顺利出版后，得到650元的巨款，她决定用此款去东京留学，完成读书的宿愿。

（四）两次去日本

1931年7月20日，她乘长崎丸从上海出发去日本。到达长崎后，“九·一八”炮声响了。国难，激烈地摇撼着她的心，她难过得流下了眼泪。她立刻想返国参加作战。经同学相劝，她才暂留日本。

不久，中国留日学生一千余人，在东京举行“追悼东北死难烈士大会”，与日本的军警发生冲突，大部分留学生带着受伤的心回到祖国。

1932年1月，她回到上海后，“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她参加著作者抗敌协会，白天参加救护工作，晚上写稿，编辑《妇女之光》。

后来，刊物被法帝国主义强行停刊，她又飘流到福建，在厦门中学教书，为《厦门日报》编辑文艺副刊“曙光”，又和谢文炳、方玮德、郭莽西、游介眉创办《灯塔》文学月刊。不久被停。

1933年11月，“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因她同其中的一些成员有过联系，被认为是福建人民政府的“妇女部长”，被当权者列档备案，她只得悄悄逃走。

1934年春，她回到上海，看到《申报》上公布的包括她在内的通缉名单，柳亚子劝她回乡一避。她只得回到长

沙，住在妙高峰青山祠里，应赵家璧之约，闭门写《一个女兵的自传》。她说：“我那时一来为了想筹备旅费重渡东渡，完成我的学业；二来借写作可以减少一点精神上的苦闷。”她拟了几十个小题目，“兴之所至，有时一连写上三天三夜也不想睡觉；有时十来天也不动笔。”

“女兵自传”陆续发表，深受读者的欢迎。

1935年，由于生活的苦闷和对读书的渴望，她第二次赴日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文学研究院攻读西洋文学，本间久雄是她的教授。

1936年4月12日，因她拒绝去欢迎到日本朝拜的伪满皇帝溥仪，被关进日本狱中，遭到严刑拷打，身心倍受摧残，始终不肯屈服。

三星期后，由于国内柳亚子等人的声援，驻日领事馆和留学生监督处的保释，日本朋友的同情、支持，逃出虎口，回到上海。

不久，取道香港去桂林，在南宁高中教国文，并编辑《广西妇女》周刊；整理十多篇散文辑为《湖南的风》，由北新书局出版。

（五）重上征途及其它

1937年，“八·一三”全面抗战开始后，她在母故父病的情况下，毅然告别家乡，赶到长沙，四天内便组织了“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举着红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的口号，重上征途，奔赴前线，又当了“女兵”！

她抱着“救一伤兵，就是杀一敌人”的信念，跑遍运河东西，长江南北，黄河流域……。 “她一面是团员的襟

姆，一面又是老百姓的喉舌；一面要为受伤的战士裹伤，换药，慰劳，一面又要为整个的队伍去后方捐募用品，宣传英勇抗战的情形……，她完全成为军民合作的桥梁了。”

（维持：《新从军日记·写在前面》）

1937年11月下旬，她从前方随大队撤到武汉之后，本拟整理旧部，训练一批新的人员，再上火线，但军部不许，只保留原有的八人，她大失所望。恰在这时，南京《新民报》迁重庆出版，社长陈铭德邀她去编副刊《血潮》。为了推动大后方的抗战文化，同时休养病体，她便到重庆为《新民报》编副刊。

不久，“为了后方的文人太多，而到前方去的太少”，她又独自去徐州前线，在李宗仁任司令官的第五战区司令部任秘书。

后来，离队撤退到南方，先后在长沙湘雅医院的战地救护队任向导，参加后勤部和负伤将士服务协会合办的伤兵招待所工作。

1939年，她在宜昌办救护人员训练班。

1940年，她去西安主编《黄河》文艺月刊，这是西北国统区仅有的大型的纯文艺刊物。这时期，她出版了《新从军日记》、《在火线上》、《战士的手》、《写给青年作家的信》、《抗战文选集》、《在日本狱中》等。

1943年，她离开西安到成都，在制革学校任教。

1945年，抗战胜利后，她赴武汉任《和平日报》（原《扫荡报》）与《中华日报》副刊主编，还创办幼幼托儿所。

1946年，借资出版《一个女兵的自传》（中卷）。后

应母校北京师大之聘，去讲授“新文艺习作”。同年，在北平复刊《黄河》月刊，仍任主编。

1948年，应聘到台湾师范学院（台湾师大前身）任教授，讲“国文”和“新文艺习作”。从此，一直在海外流落至今。

紧扣时代脉搏的散文创作

谢冰莹是一位勤奋劳作，默默耕耘，不断追求的人。六十多年来，她出版了60多部作品，一千多万字，其中散文集有：《从军日记》、《麓山集》、《军中随笔》、《湖南的风》、《抗战文选集》、《生日》、《爱晚亭》、《战士的手》、《绿窗寄语》、《梦里的微笑》、《一个女兵的自传》、《女兵十年》、《新从军日记》、《在日本狱中》、《冰莹游记》等。《从军日记》和《一个女兵的自传》在国内国际引起强烈的反响。前者被翻译成英、法、俄、日、朝鲜等国文字，法国伟大作家罗曼·罗兰致函作者，表示赞赏；后者重版二十余次，并在许多国家翻译出版，至今仍拥有广大的读者。

谢冰莹的散文为什么具有如此巨大而长久的艺术生命力呢？她曾说：“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作品，每一个时代的作品取材和思想，也必定和其它时代不同。”也就是说，她的散文始终紧扣时代跳动的脉搏，贯串着“叛逆——追求——爱国”的思想红线，洋溢着浓郁的时代精神，高奏出一曲曲时代的主旋律，具有强烈的批判力和震撼力。这，就是她的散文艺术魅力之所在。

谢冰莹散文中的时代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封建礼教的叛逆和对革命的追求。

谢冰莹的少年时代，封建礼教的绳索紧紧地束缚着她，直至进入青年时期，她在爱晚亭畔狂啸奔跳时，仍感到莫名的惆怅。她说：“我愿以我这死灰、黯淡、枯燥、无聊的人生，换来欣欣向荣、生气蓬勃的新生命！”“我愿所有的过去和未来的泪珠，都付之流水！”“我愿将我所有的一切，都化归乌有，化归乌有呵！”（《爱晚亭》）深切的悲哀是她对禁锢她的封建礼教的控诉。因此，反抗与叛逆，便构成了她青少年时代生活的主要内容。

自然，反抗与叛逆的目的是追求自由，追求革命。所以，当北伐战争的枪声一响，她便在二哥的支持下，决定“当兵去”！“因为这年的冬天母亲要强迫我出嫁，要想逃脱这个难关，我非离开长沙不可！”同时，她借用二哥的话说：“这是唯一解放你自己的路，只有参加革命，婚姻问题和你未来的出路问题，才有办法。”（《当兵去！》）但好景不长，女兵队解散后，她只好回家，又被母亲逼迫出嫁，甚至被关了起来。她呼号，她痛哭，她挣扎。她清醒地认识到：“我的问题，绝对不能和平解决的，父母已与我处于绝对相反的地位，我不能屈服，他们更不肯让步，不肯放弃做父母的权威。他们一定要贯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封建社会的法律，而我恰恰是反对封建社会的叛徒，这样，相隔两三个时代的父与女的思想，怎能不冲突呢？无疑地我只有和家庭拚命奋斗，才能获得我的自由，争取最后的胜利！”（《被母亲关起来了》）这